

· 人文城市研究跨学科学术共同体 · 文明互鉴与城市中国（五） ·

城市中国的智能进路与未来

陈 忠

【内容摘要】 城市化、智能化及其深层互嵌正在深刻地改变世界、改变中国。城市与技术的互嵌既有正向效应，也有负向效应。能否保持人性与技术的合理张力，将深刻决定城市化、智能化及其互嵌的文明属性、发展质量。关键在于，如何打破技术与城市相互制约的“静态生态”，进入相互激活的“动态生态”。“适度的文明”与“在轨的野蛮”同在，文明与野蛮之间存在合理张力，这对现代城市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同新技术特别是媒介技术（从信息化、数字化到智能化）的迭代发展有着对应关系。城市中国与智能中国的良性互生，内含着具有世界意义的重要经验：注重技术、城市进步同社会整体组织与运行的良性互动，同我国文明特质的共生、共进，坚持技术与城市发展的公共性、人民性。智能时代的城市中国也面临一些挑战，面向未来的智能中国、城市中国，既需要尊重技术进步的优先性、相对独立性，也需要对技术创新与运用进行合理的组织、规范，并不断建构有中国特质的空间文明、市场文明、秩序文明。

【关键词】 城市中国 智能时代 中国特质 在轨激情 人民性 公共性

【作者】 陈忠，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江苏苏州 21500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城市中国的文明特质’哲学研究”（25AZX013）

城市社会的智能问题：技术与人文

城市化、智能化及其深层互嵌正在深刻地改革世界、改变中国，那么，如何看待城市社会的技术基础、智能趋向？智能化对于城市社会有何多维、辩证效应？城市中国如何塑造了自身的智能特质？智能化又会如何影响城市中国的文明特质？不断智能化的城市中国正遭遇哪些问题、面临哪些挑战，如何应对？本文将对城市社会的智能问题、智能本质及其中国特质、中国进路，进行历史哲学与文明批评史反思。

城市是人类的核心栖居地。随着城市的体量增大、人口增加、分工细化、功能重合、结构复杂化，





其技术含量、智能程度不断提升是一个重要趋势，否则，不同分工、领域之间的沟通、协作将无法实现，城市的秩序、效率无法保障，甚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也会受到影响。但城市的技术化、智能化同城市的人性化、文明化并不一定对应。“技术指的是，建立在生产过程中，由知识和活力带来的、规定一套特定的生产手段和生产工具的介入。”^①技术是人类的发明、人的能力的专题性“外挂”，但技术的运用未必符合人性；城市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明，但城市的某些方面也可能具有野蛮性；城市与技术的互嵌既可能具有正向的成就效应，也可能具有反向的问题效应，关键在于能否形成具有人文底蕴的互动生态。

①③④⑤ 卡斯泰尔：《信息化城市》，崔保国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页，第16页，第188页，第251页。

在《进化中的城市》中，格迪斯对城市与技术的关系进行了反思。在他看来，不同类型的技术对应不同类型的城市。他将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分为两种，一是以煤炭为基础的旧技术，一是以石油为基础的新技术。“简单地将‘-lithic’（石器）替换为‘-technic’（技术），我们可以将工业时代中前面的一个粗野的阶段称为旧技术时代（Paleotechnic），把刚刚开始的一个阶段分解出来，称作新技术时代（Neotechnic）；而对于这两个阶段的人们，姑且冒昧地分别称之为旧技术时代人类（Paleotects）和新技术时代人类（Neotects）。前者属于煤矿秩序，至今仍发挥着主体性作用；依靠蒸汽机，包括大多数的制造业；铁路和市场也是如此，随之而来的是拥挤而单调的工业城镇。”^②格迪斯认为，煤炭等旧技术条件下的城市往往环境恶化、社会分化、人们生活不幸福，具有一定的非人性、异化性；而石油、电力等新技术，则为建设更具有公共性、人文性、生态性、生活性的城市提供了基础。格迪斯批判了旧技术条件下的城市，并对新技术的城市效应持乐观态度，但问题在于：旧技术条件下的城市问题是技术造就的吗？新技术一定带来更合理的城市吗？

② 格迪斯：《进化中的城市》，李浩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年，第34页。

在《信息化城市》中，卡斯泰尔对信息技术条件下的城市进行了反思。在他看来，当代社会，信息技术正在成为渗透性的技术，“新的信息技术正在改造着我们的生产、消费、管理、生存及死亡方式，当然并不是经由它们自身，而是作为决定人类行为与社会结构的更广泛的系统因素的强有力的仲裁者”。^③信息技术、信息产业的发展引致全面的社会变革、社会结构重组，生成了新的二元社会、二元城市，为一部分人带来机会，也影响了一部分人的工作机会。“新技术对工作和就业的潜在冲击力给人们和社会经济同时带来希望和恐惧。一方面，技术革命在所有生产部门的扩散使生产力提高成为可能，从而为经济的复兴铺平道路，并开启了一个变革和发展的新时代；另一方面，剩余劳动力的增加将使失业状况、职业的功能和组织结构进一步恶化，特别是在成千上万的工作机会尤其是加工工业的工作机会减少的时候，这种恶化更加令人担心。”^④“二元化城市，用传统社会学的术语来说，就是把新的信息生产者的世界主义与重组劳动力的相互割裂部门的地方主义对立起来。”^⑤卡斯泰尔对信息技术条件下的城市问题的揭示无疑非常深刻，那么，既然新技术似乎总是有问题，为什么城市仍在不断催生更新的技术？人类有无可能既发挥新技术的正效应，又避免其负效应？

⑥⑦ 基辛格等：《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第265—266页，前言第1页。

近年来，人工智能对现代文明包括城市社会的影响日益扩大，诸多城市着力推进智能城市、智能文明建设。基辛格等认为，发展人工智能具有必然性，“人们会意识到，为了获得某些知识，我们可能需要委托人工智能为我们获取知识，并向我们汇报。无论答案是哪一个，随着人工智能追求的目标愈加全面和广泛，在人类看来，它都将越来越像一个体验和了解世界的‘生灵’——一种结合了工具、宠物和心智的存在”。^⑥人工智能正在全面改变人类生活，“人工智能将引发社会、经济、政治和外交政策领域的划时代变革”，^⑦“由此产生的结果将是人类身份的转变，以及人类

对现实体验水平的提升，所达到的高度是人类自现代曙光初现以来从未企及的”，^①“这种技术正在改变人类的思想、知识、感知和现实，并在此过程中引发了人类历史进程的变迁”。^②在肯定人工智能正向效应的同时，基辛格也对其可能的负面效应进行了反思，认为“对人工智能的目标和授权都需要谨慎地设计，尤其是在其决策可能致命的领域。我们既不应该将人工智能视为自动运作、无须照管的存在，也不应该允许其在无人监管、监视或直接控制的情况下采取不可撤销的行动。人工智能由人类创造，故也应由人类来监管”，^③“人工智能的伦理道德是必不可少的”。^④基辛格对人工智能之文明效应的反思无疑是及时的，但问题在于：人工智能的兴起，是否意味着既有的技术、文化、传统已无价值与存在可能？人工智能是引致同质化的文明与城市，还是更为多样的文明类型、城市文明？不同的文明区域、城市社会，会否生成、需要、运用相同的人工智能？

我们认为，反思文明史、城市史，以及技术与人性、技术与人文的关系，是一个贯穿性的问题。城市是多样异质文明要素的空间化聚集，是人之创造性、社会性的对象化呈现，是人按照自身的尺度与需要，运用各类材料与技术所营建的生产与生活场域。城市发展的一个内在趋势是城市的设置、装置、运行等日益具有仿生性、拟人性、智能性，可以更为全面、快捷甚至个性化、体贴地满足多样人群的多样身心需要。这种趋势的实现，当然离不开技术的不断积累、进步，离不开各类新技术的涌现与运用，更离不开人们对技术的约束、组织、管理。技术可以用于发展，也可以用于破坏；可以用于维护和平，也可以用于战争；可以用于扩大自主，也可以用于强化管控。没有对技术与人性之关系的合理确认，没有技术与人文之间的合理张力，没有对技术的合理运用、人文治理，一个城市与社会或许会稳定、发展、繁荣一时，但大概率难以可持续稳定、发展、繁荣。当代中国，合理推进城市社会的智能化，需要以技术与人文的张力为基础，具体把握以下问题。

其一，如何理解城市社会的智能本质。走向智能化社会，是人类社会已经呈现的客观趋势。但这是否意味着智能化是人类文明包括城市社会的唯一维度，城市社会所有方面、所有传统都可以智能化？人工智能是单纯的技术进路，还是一个需要诸多物质与文化条件的综合进程？智能化是否有其边界与限度，是否需要若干非智能的条件与基础？人类文明、不同文明体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在人工智能时代是否仍有价值，会以何种方式发挥作用？城市生活的丰富性、多样性与技术化、智能化是何关系，是技术化与智能化推动了城市迭代，还是城市发展推动了技术迭代？人工智能、智能化的文明本质与哲学本质究竟是什么？

其二，如何理解技术的综合城市效应。反思技术史，技术化、智能化无疑是文明的进步，但技术的每一次转换，似乎也会在新维度上激活人的野蛮性。现代城市是人口高密度聚集之地，也是各类智能设备聚集之地。现代城市中的每个主体原则上都有更多的机会运用人工智能为自身赋能。在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无疑具有巨大的文明效应。但同时，人工智能也可能被滥用，从而呈现出非文明性甚至野蛮性。比如，智能手机、智能录像与传输设备可能被人们用于不当用途甚至战争。如何防止智能社会的野蛮化，为智能社会立法，提升人们的智能素养，具有迫切性。

其三，如何理解城市中国的智能特质。我国用几十年的时间完成了其他国家二三百年的城市化历程，正在成为数字化、智能化具有一定领先性的城市中国。我国城市化的技术与智能之路，其中有何经验？技术进步、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往往会冲突高发甚至走向秩序失控，我国如何实现了技术、城市高速发展同社会秩序稳定的共存？不断智能化的城市中国，为何能够比较好

①②③④ 基辛格等：《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前言第3页，前言第4页，第269页，第267页。



地处理了文化遗产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智能时代城市中国的文明特质，亟须进行哲学反思、理论概括。

其四，如何建构城市中国的智能未来。进一步推进城市中国的智能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这是一个有代价、可能引发问题的过程。不断智能化的城市中国正在遭遇何种问题与挑战，如何实现城市中国的持续稳定、发展、繁荣？这是一个高度复杂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具体确认城市与技术的哲学本质、复杂关系，把握城市中国与技术中国、智能中国相互关联的文明特质，确认城市中国与智能中国良性互嵌的价值基点，探索城市中国进一步智能化的平稳可行策略。

城市社会的智能本质：物性与人性

反思文明史、城市史，人类似乎一直在追求自动化、智能化，以使空间、设施、装置乃至整个人工环境包括城市，可以更全面、更快捷地满足人们的多样需要。“至少，在过去三千年内，机器一直是我们的古老的技术传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①陶器、纺车、日晷、纸张，是农耕文明时期人们追求自动化的重要标志；蒸汽机、机械生产、机械钟表、机器印刷，是工业文明早期人们追求自动化、智能化的重要标志；电动工具、电子计时、机器计算、报纸期刊，是工业文明中期人们追求自动化、智能化的重要标志；互联网、电子书籍、云存储、人工智能，是当代人追求自动化、智能化的重要标志。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自动化特别是智能化。自动化，指机器在多环节同时代替人的体力劳动，高速、大量地生产出人们所需要的产品；智能化，指机器与软件在多环节代替人的智能劳动，快速高效地为人们提供知识与信息。从要素、材料构成看，不管是自动化，还是智能化，其基础目前都主要是无机物、无机材料，依托的是人们用各类材料生产的具有似人能力、智慧的机器、工具。虽然，未来有可能出现由人工合成的受控有机材料构成的自动机、智能机，但无论如何，自动机、智能机，其要素构成、运行机制都与人类有重要区别，都是由人类创造出来，可以代替、增强人的体力与智力的某种工具机。人们之所以将其中的某些工具机称为人工智能，是因为从其功能、运行结果看，人们难以区分任务是由人类完成的，还是机器完成的。这个从功能、结果而非结构、材料角度进行的智能定义，是由图灵给出的。

1943年，人类研制出电子计算机，机器与智能的关系，如何认识与定义智能，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1950年，数学家和逻辑学家艾伦·图灵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在他的论文《计算机与智能》中，图灵建议把机器智能的问题完全搁置。图灵认为，重要的不是智能的机制，而是智能的表现。他引入‘模仿游戏’提出，如果一台机器对游戏的操作非常熟练，以致观察者无法区分它和人类的行为，那么该机器就应该被冠以智能之名。”^②“1956年，计算机科学家约翰·麦肯锡进一步将人工智能定义为‘能够执行具有人类智能特征的任务的机器’。”^③

所谓人工智能，其哲学本质是：人们运用各类物性材料生产出的具有一定人性特点特别是人的智慧特点的机器，是人们运用物性来模仿、实现、放大、增强人性，从而专门、专项化地代替人更为快速、长期、专注地进行某种知识整理、知识发现甚至逻辑、推理活动的工具机。这种专门、专项性的行动日益成功，以至于让一些人开始担心人工智能会否在某一天全面超越人类。这种担心本身是抽象的且有逻辑问题。所谓抽象，就是它其实没有可重复的生成机理与实现路径；所谓逻辑问题，就是把一个点的成效与结果无机理、无路径地放大为整体的成效与结果。人工智能是

① 芒福德：《技术与文明》，陈允明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第11页。

②③ 基辛格等：《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第64—65页，第66页。

人通过特定的物性材料、设备、软件等“外挂”，对象化某种人性、人的某种能力（比如知识分类、逻辑推理等）的方法，是人性从可能性、潜能变成对象化现实能力的一种方法。其实现与运行需要缜密的设计、精密的设备、新型的材料、系统化的产业与工程基础、复杂的组织管理系统，不存在可以全面实现人的所有能力的人工智能。在这个意义上，对人工智能的恐惧，其基础是一种经不住历史与实践检验、理性与逻辑验证的假想。

问题的关键在于，随着自动化、智能化的不断推进，人性、人的能力与需要在不断进行新拓展的同时，自然进化与长期历史中形成的人的诸多基础需要、传统人性内容，是否会消失，变得没有价值。人工智能是同自然人性、传统人性的断裂，还是在其基础上的人性的新拓展？反思文明史、考古史、城市史可以发现，人类进步很少以断裂的方式推进，积淀与发展、传承与创新相统一是文明进步的重要特点。

马克思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①人必须首先吃穿住用才能做其他事情，人的每一种器官与感觉都代表人性的某一方面。人性的基本需要如吃穿住用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会消失。肉体层面的安全、生存、健康，在任何时代都是基本需要，这一点不会随着自动化、智能化的推进而改变。虽然，自动化、智能化会改变人们吃穿住用的内容与方式，但不是所有的内容与方式都需要改变。对于人性的有些需要的满足，比如为了健康跑步、散步，传统的内容与方式已经够用，而不需要多少创新，再智能化的跑步机、运动场所、运动软件都不能代替人们亲自进行感性运动，都不能直接给人带来健康。智能化的重要作用是提高知识进步、知识普及的速度，提升社会生产各领域的工作精度、工作效能，提升人们之间沟通的效率与准确度，提升社会运行的秩序与效率。从长期来看，人工智能最终只会是满足人的需要的诸多工具中的一个小门类。

从人性与物性的关系看，一方面，智能化是人们对各类物性材料的新加工、新组织、新运用，并以此获得具有诸多类人智能的功能，这种类人智能无疑是一种创新；另一方面，智能化是服务于人的幸福生活的手段，而人的幸福生活的诸多内容从古至今没有多少变化。这样，智能化的目标是有利于人类已有的健康文化与生活方式的传承，并使更多的人可以获得幸福美好的生活，而不是取代人们已经获得、已经积累的合理文化与生活方式，或仅仅有利于少数人的生活与利益。人工智能既是拓展人性的工具，也是传承人性的工具，是运用物性服务于人的幸福生活的工具。人工智能的人性物性张力，在城市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城市是文明的核心场域，是人性与物性双向开启、双向赋能的核心场域，更是多样人性以及人的多样需要、多样能力得以传承的核心场域。城市是各类一级物性对象（未经人类加工的材料）、二级物性对象（经过人类加工与合成的物性材料）的高密度聚集；城市是各类人群，具有多样观念基础与多样需要的异质人群的高密度聚集。这种聚集，使城市成为物性与人性双向打开、复杂扭结最为充分的场域。物性与人性的这种高密度聚集中的双向打开，是催生各类复杂工具、自动机、智能机的重要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自动化、智能化是一种城市生成物，而自动机、智能机一旦产生，又会赋能城市，成为城市进化的动力。人工智能的重要正向效应，是不断生成更具人性、人文性的智能工具，并不断生成更有利于人性全面发展、有人文底蕴的城市。这种机制正如马克思对自动工厂的揭示，“自动工厂消除着专业和职业的痴呆”。^②这是自动工厂革命的一面。随着自动工厂的推进，“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出来”。^③

①②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9页，第630页，第630页。



其一，作为复杂人性聚集地的高密度城市，为新技术包括智能化的生成、普及、提升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需求动力。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技术进步主要经历了机器化与规模化、自动化与信息化、数字化与智能化等阶段。这些进步基本发生于城市特别是有一定规模和密度的城市。人们可以对其中的机理进行诸多维度分析。在历史哲学、城市哲学视角中，可以说，没有以城市为语境的多样人工、多样分工、多样观念、多样产品等的聚集，就没有从机器化、自动化到智能化的不断迭代。正是以城市、不断发展的城市为基础，各类技术才得以日益快速地试错、进步、传播、积累，并最终生成了今日的人工智能。而人工智能的未来，也将取决于城市能否继续发展，能否为其提供更多的场景、需要。大型高密度城市是自动化、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不断迭代的强大动力，没有现代城市发展，没有相当数量与素养的人口等文明要素的高密度聚集，也就不可能产生人工智能。虽然我们无法预见人工智能的未来形态，但唯一可以预见的似乎是：人工智能是现代城市社会的历史产物，城市化进程与质量提升的中断也就是人工智能的终点。

其二，作为人性、人的能力之对象性“外挂”的人工智能，为城市生产、生活、秩序等的稳定、高效提供了重要保障。麦克卢汉对现代传媒的作用进行过揭示，认为“电力媒介的趋向，是在一切社会制度中造成一种有机的相互依赖性”。^①“我们离一个自动控制的社会已经很近，近得可以想象出来，其控制程度也很高。”^②“这是一个黄金时代的形象，一个将自然完全变形或转换成人为技术的世界。它已经近在咫尺，我们的电子时代对这样的世界伸手可及。”^③这种揭示基本适用于描述智能化对城市社会的影响。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人口向主要城市聚集，格莱泽在《城市的胜利》中认为，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这种进程无意中契合了成本最小化、收效最大化的经济学原则。在高密度的大城市中，人们可以更为便利地享受到彼此的外部性，从而大大降低城市与文明运行的综合成本，并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降到最小。^④而现代城市之所以能够成为符合经济学成本收益规律的场域，其重要物性支撑、物性基础是不断生成的新技术，包括数字技术、智能技术。如果没有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的生产体系、沟通方式、组织管理，现代城市可能一天也无法正常运行。

人工智能是现代城市的产物，现代城市社会也是数字化、智能化的产物。人性与物性通过城市与技术的双向敞开而得以沟通。能否保持人性与技术的合理张力，将深刻决定城市化、智能化及其互嵌的文明属性、发展质量。

智能技术的城市效应：文明与野蛮

人工智能与城市社会的融合，深刻改变了人类周围的物性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人们所表现出来的现实人性。“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⑤人工智能提高了生产效率与精度，提升了流通效率、管理效能，不断合成新的材料，为这个世界提供了更多的物性成果。在物性层面，人工智能正在极大提升城市社会的文明量级。在人性层面，人工智能也正在重新定义人的肉体生产、精神生产、知识生产、情感方式等。运用人工智能，人类对人的肉体生命的把握将更微观、更整体，不断发现、开发人的各项潜力，并为解决人类遭遇的诸多病痛发现、发明新方法。人工智能加速了人们的知识积累、知识传承、知识整理、知识融合进程，使人们可以更为快捷、全面、深层地掌握世界各领域的运行机理。在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具有深刻的正向城市效应、文明效应。

①②③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79页，第42页，第79页。
④ 参见格莱泽：《城市的胜利》，刘润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32页。

但也应该看到,人工智能也表现出深刻与独特的负面城市效应、文明效应。或者说,人工智能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问题性甚至“野蛮性”。人工智能是一种高耗能、高耗材的技术,其物性基础是纯度更高的硅等各类材料和各类复杂的精密仪器,其运行环境的纯度要求也较高。这些材料、仪器、环境,最终都来自对自然的深层开发。也就是说,人工智能是建立在对自然的更深层开发、掠夺基础上的,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具有一定的野蛮性。在人与人、人与自身这个维度,目前人工智能的运用减少、弱化了人们的感性交往,使人在更多时间里成为面对手机等电子装置的个体存在物。缺少感性交流的人更容易患上各类精神病症,行为异常,甚至可能成为伤害自身及他人的“野蛮人”。我们需要从机理层面把握人工智能的辩证文明效应、辩证野蛮效应。

在麦克卢汉看来,技术在拓展人的某种能力时,也会关闭其他能力。人们使用某种技术时会享受其便利,也会受其制约。“任何发明或技术都是人体的延伸或自我截除。这样一种延伸还要求其他的器官和其他的延伸产生新的比率、谋求新的平衡。”^①这种特定维度的同时性延伸与关闭在新技术时代尤其明显,并带有强制性。“比如,电视形象所引起的新的感知比率或感知关闭,是没有办法不去服从的。但是,电视形象进入生活所产生的效果,却因文化的不同而不同,其差别随每一文化现存的感官比率而定。”^②人运用技术,也被技术所修改。“从生理上说,人在正常使用技术(或称之为经过多种延伸的人体)的情况下,总是永远不断受到技术的修改。反过来,人又不断寻找新的方式去修改自己的技术。人仿佛成了机器世界的生殖器官,正如蜜蜂是植物界的生殖器官,使其生儿育女,不断衍化出新的形式一样。”^③人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成为机器的工具、仆人,机器则成为主人甚至上帝。“由于不断接受各种技术,我们成了技术的伺服系统。所以,如果要使用技术,人就必须为技术服务,必然要把自己的延伸当作神祇或小型的宗教来信奉。”^④技术带来的效应究竟是文明还是野蛮,是一个具有高复杂性的历史哲学与文明批评史问题。

在《技术与文明》中,芒福德对技术的辩证效应进行了反思。他认为,从理想的状态看,技术可以服务于所有人,具有长期主义意义上的“善”性。“技术,从其起源时刻开始,就与人类本质属性互相联系。并且,人类的这一根本属性,已经体现在其生产活动的每一方面。可见,技术从一开始就是以生命、生存为中心的(life-centered),而不是以劳动生产为中心的(work-centered),更不是以权力为中心的(power-centered)。”^⑤但从现实进程看,技术呈现出“恶”的一面,往往被一些主体用来支配他人、增益自身。“虽然表面上宣称设计机器只是维持生存的手段,但对于产业家、发明家及其合作阶层来说,机器本身已经成为一种目标。在一个无序的、变化的、需要不断去适应的世界里,机器体系成为被牢牢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⑥诸多主体选择新技术,其直接目的不是为了利他、利人,而是为了自利,减少用工成本,进而更加方便地使用、控制他人。“技术与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是人类的,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选择、智能活动和奋斗的结果。一方面,它显然是极为客观的和科学的,而另一方面又常常是非理性的。”^⑦“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归根究底,‘机器体系’并不是被动依附于技术的副产品,并非是通过各种小聪明和小改进,最终得以扩展到社会活动的全部领域。恰恰相反的是,机器纪律和很多重大发明都是精心刻意地创造一种机器生活方式的结果。背后的动力不是机械效率,而是一种神圣感,或者说是对他人的支配力。机器在发展的过程中不仅拓展了这些目的,而且为实现这些目的创造了物质条件。”^⑧我们需要对技术的人性效应、伦理效应进行更为具体的反思。

任何对象都是复杂、多维、多属性的,当人们将一个对象确定为一种属性时,往往会忽视甚至漠视了这个对象的其他属性。从生命科学层面看,人类的基因组相对固定、基本统一,但现

①②③④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第61页,第61页,第62页,第62页。

⑤ 芒福德:《机器神话》上卷,宋俊岭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第9页。

⑥⑦⑧ 芒福德:《技术与文明》,第321页,第9页,第321页。



①②③ 道金斯：
《自私的基因》，卢
允中等译，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18年，第337页，
第342页，第352页。

④《马克思恩格
斯文集》第1卷，
第537页。

⑤⑥ 埃利亚斯：
《文明的进程：文
明的社会发生和
心理发生的研究》，
王佩莉等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年，第448页，
第449页。

实中的每个人都会因为环境等影响具有不同的表型，往往会特异化某种机能，同时弱化某些机能。对基因而言，没有设计好的最优表型，而只有特定的环境条件下的具体表型，“任何基因的表型效应并不是这个基因的私有物，而是要在它所起作用的胚胎环境共同帮助之下才能显现”。^①“谈论一个给定基因与环境无关的绝对化的表型效应，根本就没有意义。”^②“就像河流选择阻力最小的下山路线，因此总是蜿蜒流向大海，但绝不会走一条直线，一个种系也是如此。其进化的历程总是根据任何一个给定时刻可用的基因变化来选择出某种效应来。一旦一个种系已经开始在一个给定的方向上进化，这本身可能就会关闭此前其他可用的选项。”^③人性的发展、外显与此类似，技术及其产品作为人类创造的重要人工环境物，也会打开、强化人性的一些维度、某些潜能，同时也会弱化甚至关闭其某些维度、潜能。马克思认为：“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活动范围。”^④技术与人性的这种复杂关联或许是技术包括人工智能具有辩证效应的深层机理。

这涉及如何看待文明与野蛮。当考古学家、文明史家将城市作为文明的核心标志之一时，这里的文明主要是指人所创造的对象物及物性成果，而不是评判城市中人们的生活是否幸福、行为是否得体、道德修养水准如何。也就是说，这里的文明是在第二物性也就是人所创造的物性这个意义上的文明，而不是主体性、主体间性意义上的文明。从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维度看，这些物性层面的文明却可能是野蛮的，比如工具或空间用来杀戮、伤害他人。《文明的进程》的作者埃利亚斯，则是从行为这个层面定义文明，认为文明主要指绅士气质，人们在行为上自律，懂得约束自身，顾及他人，具有公共性，“心理自我强制乃是每一个‘文明’人的最重要的一个特征”。^⑤他认为，行为的文明化起源于中世纪后期，“抑制一时的冲动，克制情绪的爆发，超越眼前而扩展思考的空间，想到过去的原因和将来的后果，这是相同的行为变化的不同方面，也是那种随着体力暴力的独占化，随着在社会空间行为链条和相互依存的扩展而必然发生的行为变化的不同方面。这是在‘文明’意义上的行为变化”。^⑥问题在于，这种对自身的约束却可以成为对自身全面发展的一种压制，成为压抑人性全面发展的一种“野蛮”力量。文明与野蛮本身及其关系具有辩证性、复杂性。

人们建构城市的一个重要动机或目的是获得安全，比如防范动物、抵御外敌。在这个意义上，城市是人们用相对“野蛮”的力量改变自然、从自然中独立出来的过程。这种野蛮是人们具有进取性、创造性的一种表现。人们一旦进入城市这个安全领域，往往会把克服生物性、野蛮性作为重要目标，以获得主体间性、自我约束意义上的文明性，而这就会压制人们的创造性。也就是说，野蛮性与创造性具有一定关联，人们在克服野蛮性而获得文明性的同时，会丧失一定的创造性。如果从此以后，不再有外部竞争，同时自然条件无限富足，那么，这种状态是可以延续的，去野蛮性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在于，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人口及其需要是不断增加的，外部竞争也始终存在。这样，具体共同体、具体城市对人性中野蛮性的全面压制就可能这个共同体的生存危机。也就是说，在反思的意义上，文明性与野蛮性都是现实城市共同体存在的必需条件。只有文明性、约束性，城市将失去活力与动力；只有野蛮性、进取性，城市将没有秩序与安定。技术是服务于人的文明成果，其生成与运用往往有野蛮性。对人类社会、城市社会而言，文明与野蛮都需要，但都不能过度。如何认识与保持文明与野蛮的张力，是所有社会与城市共同体需要正视的问题。“适度的文明”与“在轨的野蛮”同在，文明与野蛮的合理张力，是复杂竞争世界语境下城市存在与发展的必需前提。

城市中国的智能之路：经验与特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历程同新技术特别是媒介技术（从信息技术、数字技术到智能技术）的迭代似乎有某种对应关系。反思这种对应关系，对我们具体把握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的运行机制、文明特质，深化历史哲学、社会发展理论等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媒介本体论的重要代表基特勒看来，对人而言，技术特别是媒体技术是比质料与形式更为重要的现实性、此在性的存在。“在缺席与在场、远离与接近、存在与灵魂之间，并非空无一物，而是有一种媒介关系（mediatic relation）。”^①“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假设，质料与形式最初源自技术事物的范畴，后来才或多或少被强行转入自然范畴。”^②以媒介技术为线索，可以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分为三个阶段。

改革开放至 2000 年左右，是中国当代城市化的第一阶段，以信息化为重要标志。这个阶段，我国的城市化率从 1978 年的 17.92% 提升到 2000 年的 36.22%，^③这个时期也是我国纺织、钢铁、公路铁路交通、有线电话等技术与产业发展较快的时期。以媒介为线索，可以看到，这个阶段的重要特点是有线电话、电视开始走进家庭并不断升级，功能不断增加的手机开始运用并逐渐取代有线电话。这个阶段的媒介学、传播学特征可以概括为信息化。一方面，基础设施改善、人口增加的城市为信息化为特点的媒介技术与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另一方面，以信息化为特点的媒介技术与产业的兴起又为城市化的进一步提升、城市人口的进一步增加、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强大助力。传统媒介与传统城市相互制约、相对停滞的生态开始被打破，信息化与城市化相互促进的生态初步形成，是这个阶段的重要特点。

2000 至 2020 年，是中国当代城市化的第二阶段，以数字化为重要标志。这个阶段，我国的城市化加速，2020 年城市化率已达 63.89%，人口进一步向城市聚集，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不断拓展、城市体量增大、功能日益复杂。传播与媒介学视野中，这个阶段也是我国媒介技术与产业发展、迭代最快的阶段。BP 机迅速普及并很快被模拟手机取代，模拟手机又很快被数字手机取代，然后是智能手机的崛起与不断迭代，从台式电脑到笔记本电脑，从有线互联网到高速无线互联网，从短信到微信再到各类通信软件，媒介与传播的新技术、新产品不断涌现。这个阶段，是我国城市化水平提升最快的阶段，也是信息化向数字化迭代并走向智能化的阶段。城市与媒介相互制约的生态进一步被突破，城市与媒介相互促进的生态进一步深化，是这个阶段的重要特点。

2020 年至今，是中国当代城市化的第三阶段，以智能化为重要标志。这个阶段，城市化仍保持了较快速度，2024 年我国城市化率为 67%，未来几年预计将达到并超过 70%。城市人口的提升，特别是与此相伴的各类新需要的增长，为媒介技术、产业的迭代提供了重要动力。近年来，我国媒介技术迅速从数字化向智能化迭代，各类智能终端、智能软件开始走向生产与生活的各领域，离身人工智能发展的同时，具身人工智能开始迅速推进。所谓离身人工智能，指不以物性载体方式存在的各类智能软件；具身人工智能，指具有物性载体的各类智能终端。这个阶段，人们的沟通、消费习惯开始改变，逐渐习惯了网上支付、手机支付、配送到家等，并对智能机器、智能汽车、智能住宅等有了更多需要。这个阶段仍处于进程之中。城市与媒介的互生关系进一步被激活，城市化与智能化相互推动、相互融合，城市中国与智能中国深度互嵌，是这个阶段的重要特点。

城市同媒介技术是一种既可能互为动力，也可能互相制约的关系。城市化的推进，离不开技

①② 基特勒：《走向媒介本体论》，王敏燕等译，《走向媒介本体论：欧美媒介理论文选》，韩晓强主编，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24 年，第 7 页，第 6 页。
③ 本文关于我国城市化率的数据来源于“百度百科”词条“城市化率”。



术特别是媒介技术的支撑。有什么样的传播与媒介技术、平台、设置，就会有什么体量与功能的城市。口口相传、纸质媒体只能支撑体量较小、结构较为简单的城市。手机、网络这类传播媒介，才可能支撑体量大、结构复杂的城市。传统城市必然伴随传统的媒介与传播技术，发展的城市必然催生新的传播与媒介技术；反之，传统的媒介必然伴随传统的城市，新的媒介必然催生新的城市。

城市与媒介的关系，其本质是城市与技术的关系。城市与技术是一种既相互制约又相互推进的关系。停滞的城市会制约技术进步，停滞的技术也会制约城市发展；发展的城市会推进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也推进城市发展。在一个普遍竞争的世界，对于具体的共同体、文明单元而言，关键在于：如何打破既有的技术与城市相互制约的“静态生态”，而进入技术与城市相互促生的“动态生态”。

1978年以来，我国启动并坚持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优化治理体系、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等，不断突破技术与城市相互制约的“静态生态”，不断形成技术与城市相互激活、促生的“动态生态”。正是这种互生而不是互制的技术与城市新生态的不断形成，使城市中国的进程不断被推进，从信息化走向数字化、智能化。当代中国城市化、技术化及其互嵌生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其中内含着诸多可以进行多维度反思与总结，且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宝贵经验、规律性特征。

其一，注重技术、城市进步与社会整体组织、运行的良性互动。反思历史与现实，技术始终具有社会性、文化性、政治性，其进步与运用水平同具体共同体的组织状态有关。这一点正如芒福德所指出，技术能否得到运用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组织问题。在他看来，近代西方之所以成为技术发达的区域，与其形成了较好的技术—社会或技术—文化生态有关。“应该注意这个事实：机械化和严格的组织管理，这两者本身在历史上并非是新花样：新的仅是这种机械化和严格管理现在已是有计划地、有形地在统治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其他的文明而言，虽然在技术方面也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但显然，技术的方法和目的并未对文明产生深刻的影响。”^①“不管技术是如何完全取决于科学的一些客观的程式，技术本身不像整个宇宙一样，形成一个独立的体系。它只是人类文化中的一个元素，它起的作用的好坏，取决于社会集团对其利用的好坏。机器本身不提出任何要求，也不保证做到什么。提出要求和保证做到什么，这是人类的精神任务。”^②如果一个社会共同体在文化观念、组织管理上不接纳新技术，甚至拒斥新技术，那么，对这个共同体而言，新技术不仅难以生成，更难以发挥作用。当代中国比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市场、技术与社会等的关系，有组织地推进城市化、技术更新，有组织地统筹、协调城市化与技术化的关系，形成了技术与城市良性共生的文明生态、发展生态。这是当代中国城市化与智能化取得巨大成就的体制机制、文明生态原因。当代中国特有的注重综合统筹的社会治理生态，为城市化与智能化的良性共进、相互融合，提供了重要支撑、宏观语境。

其二，注重技术、城市进步与我国自身文明特质的共生、共进。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我国形成了多样性与共同性兼备，本土性与开放性兼容的文明格局、文明生态。正如考古学家苏秉琦、严文明所认为，“从旧石器时代直到今天，中国文化从来不是封闭和孤立的”。^③中华文明既是“满天星斗”，^④具有起源与样态的多样性；也是“重瓣花朵”，^⑤在多样性中内含统一性、共同性。在文化心理、社会结构上，正如费孝通所总结，我国乡土社会具有一种差异格局，如涟漪般的弹性社会关系：“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

①② 芒福德：《技术与文明》，第7—8页，第9页。

③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157页。

④ 参见苏秉琦：《满天星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

⑤ 严文明：《求索文明源》，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1页。

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①这种独特的文明格局、文明心态，是当代中国城市化、智能化能够较好地互嵌互生的重要基础；同时，城市化与智能化的推进，又使我国传统的文明格局、文明心态，具有了时代新特点。城市化、智能化语境下，传统的差序格局、乡土情结不仅仍然存在，还获得了新的存在方式、具有了新的特点，成为一种具有时代特点的“虚拟与数字化的差序格局”和乡土情结。^②对中国文明特质的传承式创新、创新式传承，是当代中国城市化、智能化的重点、特点。我国之所以比较好地避免、克服了西方城市化、智能化过程中的诸多风险与问题，形成了既进取又稳定的城市共同体、数字与智能共同体，与此有深刻关联。

其三，始终坚持、坚守技术进步与城市发展的人民性、公共性。西方文明语境下，人们往往强调技术与城市底蕴的分散性、单子性，认为现代技术为现代城市的去中心化提供了条件。“沉迷于老式的、机械的、由中心向边缘扩展的单向模式，再也不适合我们当今的世界。电的作用不是集中化的，而是非集中化。这种区别就像铁路系统和输电网络系统的区别。铁路系统需要铁路终端和大都会中心，而电力可以一视同仁地输往农舍和办公楼，所以它容许任何地方成为中心，并不需要大规模的集中。”^③这种理解其实源于西方文明特有的单子化社会传统。中国文化与此不同，历来强调个体与整体弹性关系基础上的共同性、整体性。“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④单子化的文明语境下，技术包括智能技术往往容易成为少数人谋利的工具。当代中国，传承、发展了我国整体导向的文化传统，从治国理念、国家制度与运行机制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此作为城市发展、技术发展的价值基点。对人民性、公共性的坚守，既为当代中国的城市化、智能化确认了方向，也为其发展提供了根本动力。

城市中国的智能未来：挑战与建构

反思文明史，任何一种新技术的产生与运用，都会触及既有的社会生态、利益生态，也都会遭遇若干漠视、抵触，甚至被一些主体归类为“恶性”技术。“每一种新的技术都创造一种环境，新的环境本身常常被视为是腐朽堕落的。”^⑤技术作为人性、人之能力的对象化“外挂”，既可能增益文明，也可能损害文明，关键在于人能否对之合理运用、是否对之失去控制。技术是世界文明的基础动力、文明竞争的基础内容。复杂竞争语境下，不希望落后的文明体既需要不断发展人工智能新技术，也需要对技术运用进行合理约束，防止其成为失控的力量。

一方面，尊重技术进步的规律性、相对独立性。“技术正变得更具有结构性和生物性。”^⑥“一切技术都是元素的组合；这些元素本身也是技术；所有技术都利用现象达到某个目的……技术的本质就是对自然的编程，它是一种对现象的捕捉，并驾驭这些现象为人类的目的服务。”^⑦技术一旦产生，似乎会自动、积累性地向前推进。“技术是自我创生的（autopoietic），或者自我创造的（self-creating）。”^⑧“技术是由其他的技术构成的，技术产生于其他技术的组合（combinations）。”^⑨没有对技术的相对独立性、专业性的尊重，不可能有技术的可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对技术进行社会约束，使技术沿着有利于人类和平、文明进步的方向发展成为一种“在轨的激情”，而不是“失控的工具”。技术“只是一系列工具而已，只有当它们能够普遍服

①④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第47页，第43页。

② 近十年来，笔者一直为本科生开设通识课《人文城市学》，其中一讲是关于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及其对城市中国的意义。2025年10月，一次课上作业报告与讨论环节，两位本科生（苏州大学2025级历史学专业的邹苏婉同学、2025级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郑沁佩同学）分别创造性地使用了“虚拟差序格局”“数字差序”这两个概念，认为差序格局也适用于当代数字与虚拟社会。特写此注，对两位同学表示感谢。

③⑤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第51页，第12页。

⑥⑦⑧⑨ 布莱恩·阿瑟：《技术的本质：技术是什么，它是如何进化的》，曹东溟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33页，第227页，前言第Ⅺ页，前言第Ⅻ页。



① 芒福德：《技术与文明》，第322页。

② 卡斯泰尔：《信息化城市》，第7页。

③ 关于城市社会的三个核心变量：空间、市场、秩序，参见陈忠：《城市文明：中国特质与未来建构》，《光明日报》2025年8月18日；《智能时代中国城市文化的传承开新》，《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年8月13日。

④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第27页。

务于生活的时候我们才会加以使用；如果机器体系侵害了我们，或者只是为了给资本主义的非必要机构提供支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取消它们”。^①“我们必须从社会结构的水平和社会发展的进程来把握技术。技术变革是一切社会的发展动力。”^②技术只是人类发明出来服务于人的工具，只是人类文化与文明生态中的一个部分，而不是目的与全部。

现实与历史中，人们对如何运用与约束新技术总有一个理解与适应的过程，这样，技术产生负面效应、负面后果便往往是社会与文明进步中的常态。能否正确认识与应对这些问题，将深刻影响文明体的发展质量。对当代中国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的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筚路蓝缕，每个阶段都需要应对技术运用中的诸多问题与挑战。我国较好地应对了信息化、数字化两个阶段的技术社会问题。2020年左右开始的中国的智能迭代，前景与成就巨大，也正在触发一些问题。一般而言，考察、评估城市社会的质量与水平，离不开三个变量：空间、市场、秩序。^③智能时代的城市中国在这三方面都面临一些挑战。

其一，从空间维度看，数字、网络、智能空间对已建成的物性空间构成影响。通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我国建成了生产、生活、消费等大量空间，比如住宅、厂房、商场、酒店、写字楼。但这些建成空间往往是按照网络社会、人工智能普及之前的理念设计，随着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推进，生产、配送、生活、消费的方式及其对空间结构、功能、布局等的需求正在发生重大转换。这样，大量建成甚至还在建设的传统物性空间就成为需要更新甚至淘汰的对象。一方面，网络购物、网络消费日益发达，新的服务于数字、智能的新物性空间正在兴起；另一方面，传统的商店、餐厅生意清淡甚至难以继，正在成为失落的空间。如何转换、更新大量既有的物性空间，使其同智能时代、数字时代相适应，对城市中国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其二，从市场维度看，智能化对中国既有分工体系与市场机制构成影响。上述数字化特别是智能化对传统商场、餐厅、写字楼等物性空间产生的影响，其本质是对既有分工生态、市场生态的影响。分工不断深化、多样化，市场的资源作用变得日益重要，是现代城市社会的重要趋势。但分工一旦形成，人们往往会形成相对固定的行为能力、社会心理，市场也会形成相对固定的运行机制。当代中国的分工体系、市场机制，主要是在信息化语境下形成的。随着数字化的深化特别是智能化的推进，已有分工体系、市场机制也需要进行新的调适。走向同智能化相契合的分工体系、市场机制，是历史的必然，但其挑战与代价也可能是巨大的。智能化对分工体系、市场机制的影响，最终是对人的影响，对人的就业、生计、生活的影响。可以预见，随着智能化的普及，大量能被人工智能替代的职业人口，其生计、生活可能会受到冲击与影响。如何平稳实现这个转换，是城市中国正在面临的巨大挑战。

其三，从秩序维度看，智能化对我国已有生活秩序与治理秩序构成影响。城市与空间、技术与产业的每一次迭代，都会影响大量人口的生计、生活。理论上，几乎每个圈层、每个人都可能会遭遇下岗、转岗、待业、失业等挑战，都需要调整生计方式、生活方式、情感方式。这无疑对社会秩序与社会稳定形成巨大的压力。“我们在新鲜的电子世界中的麻木状态，与土著人被卷入我们的文字和机械文化时所表现出来的麻木状态，实际是一样的。”^④面对不断迭代的人工智能，诸多主体也会产生不知所措，不知如何选择、如何调整。这种普遍不适应的背后，是人工智能对既有生活秩序、治理秩序的挑战。关键在于，发展人工智能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趋势，人们只有调适、调整、改变自身这一条路径。而新的生活秩序、治理秩序的形成是需要时间的，在转换期难免会产生一定范围的失序。如何既保持技术更新、拥抱智能时代，又保持社会稳定、秩序良好，是城

市中国正在应对的一个重大挑战。

回顾过往、总结经验、反思问题，是为了行稳致远，更好地建设未来。保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断涌现、合理运用的良好态势，需要不断建构、优化有中国特质的空间文明、市场文明、秩序文明。

其一，完善有中国特质的空间文明。智能化在方便人们进行网络化、快捷化消费、办公、生产、生活的同时，也减少了人们感性接触的机会。中国人历来有聚集的习惯，有感性互动的需求，在数字化、智能化时代，这一点仍未改变。观察当代中国城市可以发现，密度较小、功能太过单一的空间往往难有活力；而密度较高的功能复合性空间则往往较有活力。这样，适应中国人的空间文化心理，转换空间设计与建设的理念，更新已有空间，建构较高密度的综合空间——兼备居住、消费、金融、服务等多业态、多功能的复合性空间——就成为破解智能化时代空间挑战的一个重要思路。空间功能的复合化，是我国各类虚拟空间正在进行的转换。诸多功能相对单一的虚拟空间正在进行功能融合、功能复合，比如，购物平台、视频平台、通讯平台等都在增加彼此的功能，使自己的平台更加多功能化。虚拟空间的复合化相对容易，实体空间的复合化虽相对困难，也可能是其必然趋势。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互相融合，空间的高密度化、多功能化，是城市中国空间生产、空间文明的重要特质、重要发展方向。

其二，完善有中国特质的市场文明。市场机制是复杂分工、复杂社会的自然、必然选择，市场是城市文明的内在特性之一。但在不同的历史与现实语境下，不同的文明体、共同体选择不同的市场生态、市场文明。我国有悠久的市场发展史和运用市场机制的历史，并形成了有自身特点、特质的市场文明。同西方以单子为底蕴，强调政府与社会分立的市场生态、市场文明不同，我国的市场生态、市场文明历来注重以共同体为底蕴，注重政府与社会的相互兼容、相互融通。政府及社会组织作为公共部门不仅监管市场，也会在自发市场失灵时直接承担某些市场职能。虽然，政府承担市场职能往往受到一些研究者的质疑，但从具体国情及长期主义的角度看，如果一个文明体失去了政府参与市场的可能，那么，它往往难以实现长期繁荣，难以保证市场机制长期服务于公共利益、人民利益。以人民为中心的智能中国、城市中国，尤其需要不断完善政府与社会合理共担市场职能的市场生态、市场文明。

其三，完善有中国特质的秩序文明。从社会运行与调控机制看，传统的中国城市、中国社会，往往以礼俗民约为基础，注重依靠人情、家族、社区等调解冲突、化解问题，这样综合成本相对较低，不易形成对立型甚至敌对型社会。这种特点，在当代中国城市社会仍然存在。^①虽然在诸多学者看来，现代城市社会是一种契约、法律的作用凸显的陌生人社会，但对中国而言，传统的人情心理、礼俗习惯仍有相当作用。对于城市中国而言，既存在并需要法律秩序，也存在并需要法律以外的秩序。从社会运行与调控主体看，中国是一种多主体共治的秩序有机体，各级、各类政府、组织、单位、企业等均承担着一定的秩序职能。其根本在于：中国的各社会单元，不是一种分裂、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既相对分工又相互连通的关系，在承担自身分工职能的同时，也都承担着一定社会秩序、公共秩序责任。在日益网络化、智能化的中国城市社会，这一点仍未改变。甚至可以说，网络化、智能化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种特点，为人们更快捷、智能地相互了解、相互交往，为增进人的感性互动提供了新的可能。不断完善有中国特质的秩序生态，对于智能中国、城市中国的平稳迭代、良性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编辑 屠毅力

① 参见陈忠：“差序格局”与城市中国的文明特质》，《探索与争鸣》2025年第5期；《城市中国的乡土特质》，《东南学术》2025年第3期。